

教科书外看历史

邵燕祥 著

花城
谭丛

屠

重过莫斯科

白玫瑰：1943年的鲜血

中国有个夹边沟

清华园：雕像无言

“群众专政”：回忆与思索

游民文化拉杂谈

《奥斯维辛之后》自序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教科书外看历史

邵燕祥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教科书外看历史

邵燕祥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8.5

(花城谭丛)

ISBN 978-7-5360-5171-3

I. 教... II. 邵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7679 号

责任编辑:林贤治 张 懿

技术编辑:薛伟民

装帧设计: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2.75 1 插页

字 数 25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- 1 / 前记

- 1 / 重过莫斯科
- 38 / 《梦醒莫斯科》序
- 44 / 历史的感叹
- 48 / 重读“赫鲁晓夫接见”的老照片
- 55 / 普希金咏蝗虫诗
- 59 / 日光之下无新事
- 63 / 希特勒的伎俩
- 66 / 白玫瑰：1943 年的鲜血
- 74 / 遥望诺曼底

- 78 /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声音
- 82 / 被正史所遗忘的

- 87 / 李纳《弱光下的留影》序
- 93 / 北京的城墙
- 98 / 也谈“坏分子”
- 108 / “秀才”可畏
- 112 / 中国有个夹边沟
- 114 / 读高尔泰二则
- 126 / 研究一下“吴芝圃现象”
- 135 / 说隐瞒
- 142 / 女囚们的生活
- 144 / “群众专政”：回忆与思索
-
- 167 / 清华园：雕像无言
- 173 / 好书过眼
- 177 / 大学分合史
- 181 / 关于晚年郭沫若
- 186 / 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
- 189 / 巴金是属于民间的
- 193 / 胡子和胡子以外
- 198 / 为辛笛纪念文集作序
- 202 / 说屈辱

- 206 / 相见恨晚 相别恨早
- 212 / 赠蓝翎
- 215 / 请你读一读，无论你是谁
——高耀洁《中国艾滋病调查》读后
- 222 / 读《周思聪与友人书》
- 231 / 《一个女播音员的命运》序
- 235 / 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
——《找灵魂·邵燕祥私人卷宗：1945—1976》引言
- 250 / 古之读书人已矣 今之读书人如何
- 255 / 游民文化拉杂谈
- 263 / 说“禄”
- 268 / 我们要回到辛亥革命以前吗？
- 272 / 想起了经济民主
- 275 / 从法律角度看毛泽东稿酬
——读祖丁远《毛泽东的稿酬该如何用》
- 282 / 试论假话未必不可讲
- 290 / 端阳的尴尬
- 294 / 围绕一则广告的阅读笔记
- 309 / 林凯《不受约束的思想》序

- 312 / 罗大佑的歌词
- 317 / “不屑一顾”是何人？
- 322 / 人和鬼
- 326 / 读《“嗲”》
- 330 / “非礼”六则
- 341 / 琐 记
- 346 / 新春试笔
- 358 / 盛世二题
- 363 / 辨义务，查《辞海》
- 366 / 挑 刺
-
- 370 / 小随笔
- 382 / 小随笔（续）
- 391 / 《奥斯维辛之后》自序
- 394 / 以诗代序

前 记

有人说老年人“老得只剩下记忆”，我原先还不愿承认，不承认“只剩下记忆”，也就是不承认自己“老”了，因为从年青时就看不惯“倚老卖老”，总觉得说自己老了，在中国这个提倡敬老的国度，便有让车上别的乘客给你让座之嫌。后来为了实事求是，承认已经老了，写过一篇《告别中年》，却让家人嘲笑：今天才告别，你以为昨天还是中年哪？转念一想，朱自清先生诗有“中年便易伤哀乐，老境何当计短长”之句，正是告别中年的宣言，但他那时才四十多五十不到，相比之下，难免“装嫩”之讥，惭愧了。

还是实证有说服力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翻翻这几年写的东西，竟多是老人话旧，无非几十年来的个人记忆，有的沾点说史的边，也是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不免想起唐诗，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”，不过我不是宫女，因而不



了宫廷旧事，平时不好交游，什么都浅尝辄止，记性也越来越差了，忆旧只是一鳞半爪，说史更是边角余料。虽可读，未必“好看”。人说，张中行先生晚年写的“负暄”三话，那样就很好嘛！那可比不得。张老先生学贯中西，厚积薄发，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。我所“负”的，跟他是同样的“暄”，然而我连“献曝”都不敢说，这个词语已经演化成“出谋献策”的谦词，你让我给谁“出谋献策”？还是改说“献芹”吧，一把没有厚味的芹菜，爱吃的买来尝尝，不爱吃的掉头而去就是了。

为了避免同自己过去的书重复，变成“炒冷饭”，此集主要选取了2003年来所作。按照中国旧例以虚岁计年，我在2002年壬午已是七十。过去的画家有题“八十以后作”，“九十以后作”的，我这集子里的文章也可叫做“七十以后作”，不过现在活到七十并不稀奇，故不带炫示之义，标志而已。编辑时发现前两年也有几篇与历史记忆相关的，一并收了进来。

人在时间中总有一个落脚点。看来，春秋鼎盛的中年、壮年，当然是结结实实地立足于现在，继往而又开来；正在成长期的青少年，自然是一脚在现在，一脚迈向未来；而一入老境，一脚还在现世，一脚却无疑拖在过去了。

其实，我的写作从面向现实，到更多地回眸（如今人们爱用这个词，以代“回首”“回顾”“回头看”，我却总是由此想到《长恨歌》里的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哑然失笑；时风是不可抗拒的，在这里姑且也随俗“回眸”），信不信由你，是受了年轻人的影响。“50后”回忆上山下乡早就读得多了，“70后”回忆

他们小时候玩些什么游戏，也津津有味，那时“80后”还未崛起，我想，我们这些“30后”“20后”，是不是也可以忆旧忆了？不然一旦“就木”（不，应该是“就火”），岂不真的应了“往事如烟”那谶言，让所有往事的记忆通通化为青烟吗？

不同年纪的人，各忆其旧，是正常的。我这里写的，想来须中年以后人会感到一些兴趣。主要也是可以同他们的个人记忆印证一下，而不会有其他的效果。我不信什么“经验”之说，以我有限的经验，极少人能从别人的身上，从别人的记忆、别人的经历，得到经验和教训（这是老说法，经验指成功的先例，教训指失败的镜鉴，后来大概厌烦“教训”二字，改说“正面经验”和“反面经验”了，如同命名所谓“反面教员”一样）。我看到的，是学坏容易学好难，帝王家的教育是最充分最规范的教育了吧，你看历朝历代的帝王，是不是把过去的“反面经验”当“正面经验”接受的多，以致一个一个走向败亡？

从书本上学历史是一回事，拿书本跟现实生活对照着学，又是一回事，书本各种各样，其中的一类叫做教科书，更是不可不信，不可尽信——其实又何尝限于教科书，什么书不是如此？

我这本书，更不例外，谨供参考，以至供批判，谁若说是“青少年不宜”，亦无不可。

因为我以为，供青少年读的书，总还是要朝气蓬勃，鼓舞人进取，而不是消极退却，不是让人做“两脚书橱”或盲目跟风随大流，而要习于独立思考，善于怀疑，敢于批判，宁可有



一点偏激，万不要四平八稳……许多年前，我虽因性格和家教，总是回避矛盾，少攻多守，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倒也曾有过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时候；碰了钉子，又沉默许多年后，一度重拾旧笔，便又跃跃欲试，然而，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精神的老去，无意中感到了“说理疲劳”，对自己全神贯注又仿佛舌敝唇焦的唠唠叨叨不休，终究有什么实效，从困惑而至失望。结果一是写得渐少，每每本有了些写点什么的念头，跟着就被自己给打断了；二是即便写出，笔下锐气尽失，棱角磨光，成了些可说可不说的废话。不免自哂，用五十年代的话说，很像是我最不以为然的“革命意志衰退”——我会不会变成当时的“典型”如刘世吾、马士元一流人物啊？

电脑打字时出现的联想词组，都是程序设计所有，能使人省不少事，但我所用的软件，“一”字后的头一个联想是“一落千丈”，“日”字后头是“日暮途穷”……一不留神就跑出来；我并非一个忌讳多多的人，但对无意间带出来的这类成语，三天两头碰到，还是萌生不快。我想，设计这套程序的软件工程师，未必年纪很大，但心情一定不好，才会在潜意识支配下首先想到这么些不吉利的词语，表现了浓厚的暮气。想想我近来在文字中也不止一次出现什么“垂垂老矣”一类老气横秋的话，人对人己都是不良暗示。今后必须注意，别放任一己的暮气去侵犯读者，实在老化，就不如搁笔了吧。

看这前记，是不是也够暮气沉沉的了？

2007年8月29日

重过莫斯科

此身虽在堪惊

从 1957 年春天初访莫斯科，到 2003 年秋天重来，间隔了 46 个年头。在天文时间里，这简直算不了什么，在个人，却是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。许多历史上杰出的人物，一生也没活这么长，契诃夫才 44 岁就病死了，普希金只在人间逗留了 38 年！

而在人类历史上，这 46 年经历了太多叫人不胜沧桑的大变动。我们是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出访苏联的中国记



者团，又正当 1917 十月革命的 40 周年，赫鲁晓夫在接见时，让我们捎个口信：他们准备以盛大的庆典迎接毛泽东同志的到来。我在此行中写的组诗，就题为《第四十个春天》。诗集排好了版，没有问世。因为就在毛泽东率团去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典的同时，我正式成了反右派斗争的对象。这个政治运动，不仅像是斯大林时期所谓“肃反扩大化”的重演，而且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，清除立宪民主党、无政府主义者、孟什维克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斗争。我和我的几十万同案者们的命运，就这样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。

其后，在冷战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里，陆续发生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变。号称“牢不可破的友谊”而结盟的中苏两个大国，由互相指责的所谓论战而终于分裂。在我们这里，三年大饥荒，死人无数，十年大动乱，更是冤狱遍于国中；在苏联那里，一度说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，然而卫星上天、军备竞赛和打击持异议者，都不能消解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，最后出现谜一样的突变，曾以列宁斯大林为旗帜的政党、政权一朝瓦解。

俄国人也也许从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化，特别是近年公开苏共档案以来，对几十年的历史有了较多较深入的了解。我们中国的普通人，若说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未免有些牵强，因为大家离真正的庐山远得很，庐山远在万里外的云雾之中，我们对历史深层的所知，正合着香港人爱说的：“一头雾水”。

照例到光线微弱的列宁墓里去看望逝世近八十年的列宁。鱼贯而行的不少是俄国老太太，神情凝重，只是注目为礼。倒是有些六十岁左右的中国游客，多半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大学生，绕过列宁遗体时，鞠躬如也，就像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似的。

在列宁墓外，跟他做伴的，尽是苏维埃政权时代的头面人物。斯大林的遗体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 22 次党代会后从列宁墓迁出，焚化了埋在后面赭红的克里姆林宫宫墙墙根。有一些苏联元帅和苏共总书记，各立一尊石雕半身像，依次排列着；文秀数过来，发现没有赫鲁晓夫，一问，才知道，这里都是在总书记任上去世的，契尔沃年科虽只当了年把，死在任上时身份仍是总书记，而赫鲁晓夫虽当了十一二年的总书记，可没死就下了台，死时的塔斯社消息也只称之为“养老金领取者”了，故不在塑像之列。然而我们接着发现，排尾的一个是苏斯洛夫，并没当过总书记，置身于此，类乎破格，但他是几朝元老，据说颇有操纵一切的权力和手腕，他又是意识形态的主宰，多年来力图控制苏联人的精神世界。原来立像的标准是灵活的，出于某种需要，全在掌握之间。我和文秀相视而笑，不再追问。

不过，在这个显赫位置上接受瞻仰或参观的死者，都不得不跟他们的夫人分开。我就在新圣母公墓里，发现了苏斯洛夫夫人苏斯洛娃的墓，不远还有赫鲁晓夫的墓，布尔加宁的墓，以及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里惟一的妇女，一度风头甚健



的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的墓。这个公墓似有一个好处，只讲先来后到，不以身份为序，因此参差错落，也顾不得死者们生前的恩恩怨怨了。

如今所有到莫斯科观光的人，差不多都被人领到这个公墓看看，像在巴黎差不多都要去看看拉兹雪夫神父公墓那样。这些墓园也的确比我们国内的公墓好看，因为每座墓都有不同的设计，有的堪称艺术匠心之作。北京现在除了八宝山之外，也又开辟了些新的公墓，阔人和他们的家人子女，开始关注身后的阴宅了，日积月累，将会形成一些新的旅游景点吧。

高莽著的《灵魂的归宿·俄罗斯墓园文化》一书图文并茂，其中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墓前还是一幅照片，这回已经代之以她《天鹅湖》舞姿的立体雕像。公墓的另一处，又见一座全身雕像，当代职业妇女的装束，原来是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。在这里，她是新来的。

走出墓园，已近黄昏，骤雨微晴，有一线斜阳透过云层，一阵风来，梧桐叶落，不禁想起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的句子。不过这里一切清扫得干干净净，规规矩矩，没有词里那般的萧飒。

回想四十六年前，那“第四十个春天”，虽说经过苏共二十大揭露“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”，经过波兰、匈牙利接连的动荡，我们恍惚感觉到国际共运的某种危机，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一片玫瑰色，但我所受的政治熏陶，仍然使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。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批判和革命传统，加上十

月革命以来中国革命者“到莫斯科去”的浪漫行迹，深入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对“新俄”几乎天然地怀着好感，加上苏联画报、电影歌曲对视觉和听觉的冲击，说起苏联，阳光与鲜花更像是无可更易的主调。我在当时团里算是年纪小的，比我大十岁二十岁的人其实也都差不多。我们那次访问的政治色彩很浓，我们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报道十月革命四十年的成就，藉以修补因揭露批判斯大林而露出破绽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形象。我们所要着意的自然是光明面，是辉煌、伟大、欢乐、幸福，纵的与十月革命前“生活像泥河一样流”的日子相比，横的与西方世界的两极对立和“垂死没落”、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贫穷痛苦相比；这是既定的宣传要点，也是采访时的指导思想。

这回迥然不同了，我们夫妇只是私人游历，她是初来，我虽说是重游，却并不为了怀旧。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变迁，那些团结一致或你死我活的政坛人物一个个出局了，去世了，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，依然在俄罗斯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着，这才是真实的生活，每天都有新的太阳升起的真实生活。

我在四十六年前初来时，接待过我们的，我们采访过、接触过、邂逅过的朋友，满街上的行人，大剧院里的观众，其中中年以上的想必都垂垂老矣，当年四十多岁的人，如今还有多少健在的？反正我们记者团的成员，除了我和新疆的富文（他当时44岁，今已晋九），别人都不在了，有两位，刘克林和丁九，还是在文革中自尽的。



站在红场一角，不是凭吊一个政权，而是面对着一去不复返的时间，面对着道是无情却无情的历史，想起我认识的和陌生的，那么众多的人已经不在，而我幸存，忽然觉得“此身虽在堪惊”！我得以苟活到今天，是怎样的际遇的偶然。

谁能自由呼吸

历史上，生活中，一切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。但我从小接受替别人着想的道德教谕，学会“设身处地”，后来爱上了文学，这就转化成一种身份和境遇的假设。

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 1957 访问苏联，我倒没有想象自己在四十年前的 1917 躬逢其盛，那时候连瞿秋白还没有到“赤都”来，张西曼似也还只在远东海参崴一带，传说亲眼见过列宁的柯庆施则还不知道在哪里；但我确实想过，我若在 1927 年来到莫斯科，我将会是怎样的命运？我的叔父年轻时，1926 年在上海，即将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，不幸被军阀孙传芳逮捕，从此改变了一生的道路。如果他那时成行，到了莫斯科，在尔后的年份里，他会跟着米夫、王明大抓“托派”、大反“江浙同乡会”等等，还是抵制反对，而被加上托派的罪名，遭到流放、监禁或遣返回国？简直全都不敢想象。

说到 1937 年，自然不会假设自己在莫斯科，而是想象我逃离沦陷敌手的北平，然后或从津浦路南下，或到平西平北投身抗日武装。到了 1947 年，真的参加革命的时候，是为“最